

徐志摩全集

(第一卷)

诗 集

赵遐秋 曾庆瑞 潘百生 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1991年 南宁

徐志摩全集 (卷一)

赵遐秋 曾庆瑞 潘百生 编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测绘局地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9.75 印张 600 千字

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 (平) 9850 册

(精) 3380 册

ISBN 7-5363-1314-4 / I · 288 定价: (平) 9.00 元
(精) 14.00 元

第一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入徐志摩创作和翻译的诗，共7集：

1. 《志摩的诗》；
2. 《翡冷翠的一夜》；
3. 《猛虎集》
4. 《云游》；
5. 《译写白话词12首》；
6. 《集外诗集》；
7. 《集外译诗集》。

《志摩的诗》，1925年8月中华书局初版印行聚珍仿宋版线装本，收诗55首，写于1922年至1925年。1928年8月，徐志摩删改初版本，删去《留别日本》等15首诗，并将《沙扬娜拉》1——17节删去，仅存第18节，又增加了《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》一首，编为41首，交由上海新月书店印出新版本《志摩的诗》。本全集采用改订本计收41首诗的《志摩的诗》。

《翡冷翠的一夜》，分两辑收1925年、1926年诗作和译诗，共42首，1927年9月，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。封面为翡冷翠即佛罗伦萨的维查乌大桥的一景，由江小鹣设计。卷首，收1927年8月23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，代序。

《猛虎集》、收《献词》、《再别康桥》等34首诗，又辑入《猛虎》等译诗7首，共41首，1931年8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印行。卷首，收徐志摩撰写序文一篇。

《云游》，系徐志摩去世后，友人所编，收《去游》等11首诗，又辑入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等译诗2首，共13首。1932年7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印行。应邵询美约请，陆小曼于1931年12月3日为《云游》作《序》。

《译写白话词 12 首》，收徐志摩译写李清照《漱玉词》12 首，译写时间，据陈从周分析，约在 1924 年前后。原稿为徐志摩友人、旅居美国的张歆海收藏。1985 年 4 月，徐志摩长子徐积锴自美返国探亲时带回，由陈从周整理后发表于当年《新文学史料》第 4 期。

《集外诗集》，收未辑集诗 74 首。最早的《挽李幹人》，写于 1914 年。新诗，《草上的露珠儿》最早，作于 1921 年。其中，《文亚峽》长诗一首，1927 年初载后，近 65 年来无人提及，本全集辑得后编入《集外诗集》

《集外译诗集》，收未辑集译诗 40 首，译写时间由 1922 年至 1930 年。

序

赵遐秋

1989年3月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出我那本《徐志摩传》的时候，我写下了这样一篇《序》：

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大多数都伤时忧国。要是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，他们还会忧心如焚，大声疾呼，以至四处奔走，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，以图服务社会，报效国家，振兴我们这个古老的，文明的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。徐志摩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只可惜，他没有找到真理，甚至还认错了方向。不过，要是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就象我们纪念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又一代的、一批又一批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仁人志士一样，那位曾经天真地幻想过、纯情地宣扬过并且执著地追求过的徐志摩，也是可以纪念的，应该纪念的。

中国的新文学史，和全民族的文化一样，在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生活中发生和发展，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有头脑、有才华、肯实践、有成就的作家们不断探索，努力建树，而蔚为大观的。徐志摩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只可惜，他的探索突然中止，建树还未到头，一挥手，他就乘风飞去了。而且，他在探

索中或许还有偏差，他的建树也许并不卓著。不过，要是我们真有胆识和气魄，也不乏学者的风度和气量，能把中国新文学史看作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共同创造的，共同书写的，那么，就象纪念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，或者纪念别的众多的文学家一样，才华横溢、诗思过人、文笔洒脱的徐志摩也是可以纪念的，应该纪念的。

本着这样的理解和共识，我撰写了这部《徐志摩传》。

这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纪念，也作为一个新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纪念。当然，我希望还多少表现了一些我们这一代中国文化人的纪念。

我想到了徐志摩写《罗曼罗兰》，他在那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：“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，正象是一条大河，它那波澜，它那曲折，它那气象，随处不同，我们不能划出它的一湾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。”我提到这句话，无意于比徐志摩为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，不过，一条河，哪怕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，那波澜、曲折、气象的随处不同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要是我把徐志摩比为这样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呢？我就希望我的读者，希望世人，不要划出一湾一角去代表那全流了。

不知道朋友们以为如何？

现在，我把那《徐志摩传·序》转录在这里，是想说明，本着同样的理解和共识，也满怀着同样的对于读者和世人的希望，我和庆瑞、百生一起编定了这一套5卷本的《徐志摩全集》。

(一)

1897年1月5日，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商的家庭。父亲徐申如，除了在本乡经营实业和钱庄，还

在上海办有票庄银号，曾任硖石商会会长，在沪杭一带的金融实业界也有相当的地位。徐申如夫妇给儿子取名章铤，字栖森，小名又申。1918年离开北京大学赴美留学时，他自己改字为志摩。

10岁那一年，徐志摩结束了无拘无束、乐趣无穷的儿童时代，走出家塾，进了开智学堂。这是废除科举后硖石开办的第一所洋式学堂。徐志摩进这样的学堂，寄寓着徐申如垂盼独子成龙的宿愿。1909年冬，徐志摩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小学学业。第二年春，由沈钧儒介绍进杭州府中学求学。他依然成绩优异，期终总考第一。1915年夏，徐志摩中学毕业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1916年春，他南下上海，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，即后来的沪江大学。同年秋，又北上天津北洋大学预科。1917年秋，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，他再赴北京大学，专攻法政。1918年夏，获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入学许可，赴美留学。

这中间，1915年10月29日，徐志摩遵父命与张君勱、张嘉璈之胞妹张幼仪成婚。1918年3月12日，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锰出世。结了婚，有了儿子，他个人婚姻生活的悲剧也就开始了。

1918年8月31日，赴美途中，徐志摩写下《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》一篇，畅叙他渡海西行求学异邦的豪情壮志。他在克拉克大学改进了历史系，又在康奈尔大学夏令班修了4个学分，终以一等荣誉奖提前于1919年6月毕业。同年9月中，他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攻读硕士学位，倾心于政治、劳工、民主、文明、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研究，学位论文是《论中国妇女的地位》。1920年9月，徐志摩获硕士学位。

同年10月上旬，徐志摩为追随罗素抵达英国伦敦。不

巧，罗素早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，正在中国讲学。朱望之亦。徐志摩不得不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院，攻读博士学位，导师是著名教授赖世基。半年后，经好友秋更生鼎力相助，又转入剑桥王家学院作特别生。在两年的剑桥生活里，徐志摩交友、读书，改变了人生志向，开始了诗人的生涯。

其间，徐志摩于婚外交恋林徽音，1922年3月，与在德国求学的张幼仪离异，从不幸的婚姻关系中得到解脱。

同年8月，徐志摩辞别剑桥大学启程回国，于10月15日抵达上海。省亲之后，他匆匆北上，到了林徽音生活的地方——北京。1923年春，徐志摩进北京松坡图书馆任干事，负责处理英文函件。第二年，任北京大学教授，与陆小曼相识。随后，与陆小曼私恋，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，为避风头，于1925年3月启程到欧洲旅行。同年7月回国。

其间，新月社在北京成立，徐志摩主持有关社务。1925年10月，他接编北京《晨报副刊》，并于1926年先后主编了《晨报副刊》的《诗镌》和《剧刊》。这一年的8月，和陆小曼在北海订婚。10月，结婚。1927年开始筹备《新月》月刊、新月书店。同年秋天，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，讲授英文小说流派，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英文教授。1928年1月，又兼任大夏大学教授。

这中间，1924年4月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，和他访华期间一直相随在身边的徐志摩，以忘年之谊结为莫逆之交。结束中国之旅后，同年5月29日，徐志摩还陪同泰戈尔一行去东京访问。离开日本时，徐志摩又再专程陪送泰戈尔到香港。恋恋不舍中，两人还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。1925年的欧洲之行未能如愿见到泰戈尔，曾经使徐志摩十分沮丧。以后，1928年在印度，1929、1930在上海，又三次聚会。

定居上海后，原以为婚后生活定是十分理想的徐志摩，碰

上了新的烦闷。堂上双亲不能谅解他和陆小曼的结合，打点行装北上，和张幼仪及孙儿同住古城北京去了。断绝了父亲的接济，徐志摩已经是债台高筑了。心烦意乱之事纷至沓来，他一度全然没有创作问世。他要继续在文学事业上追求，以求自我解脱。他希望得到一种新的生活状态，集中自己有限的力量，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。把他新月书店的开办看作是实现他的新的希望的一件大事。他主编 1928 年 3 月创刊的《新月》月刊，发表和出版作品，又在 1931 年 1 月 20 日和年轻的朋友一起创办了《诗刊》季刊。他想要再扬风帆，再振诗魂，全力推动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发展。

不幸的是，徐志摩的新的希望刚刚产生，还没有实现，那扰人的烦闷还在死死地纠缠着他。文笔荒疏，理想窒息，这已经叫他欲哭无泪，欲语无声了。不料，他和《新月》月刊的一班朋友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了编辑职务。更不料，他和陆小曼的结合，不久就酿成了新的灾难，以至于他要出走，要异地分居，只是恋于旧情，碍于情面，才没有最后破裂。这中间，甚至连 1928 年 6 月的再次欧游，在徐志摩都有痛苦之余加以逃避的苦衷。

为排遣这扰人的烦闷，徐志摩后来又在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《西洋诗歌》、《西洋名著选》等课。1929 年 1 月，应舒新城之邀，还兼任中华书局编辑。1930 年，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。1930 年秋后，徐志摩辞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职务，应胡适之邀，到北京大学任教授，同时兼任女子大学的教授。他想要举家北迁，换个环境，以期重整旗鼓，向上生活。无奈陆小曼执意不肯舍去上海。他只好吃住都在胡适家。

从此，心情不佳之余，徐志摩为生计，要在北平和上海之间疲于奔命。1931 年 11 月 13 日，徐志摩在陆小曼接连十几次电报催促下南返上海。其时早已移情别恋的陆小曼，和徐志

摩大吵一架。深感婚姻失败的徐志摩，于18日离家出走，乘早车到了南京。

1931年11月19日上午8时。雾中，徐志摩搭中国航空公司邮政班机济南号北飞北平。午后2时，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误触开山坠毁。徐志摩不幸遇难，时年，仅35年。

(二)

年轻时候的徐志摩，最初领受到的家教父训是：学习西方金融实业管理知识，以继承和发展家业。但是，他生不逢时。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，眼看政治更加腐败，国家更为贫弱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，作为一个热血男儿，刚刚赴美留学时刻的徐志摩，想得更多的是：“方今沧海横流之际，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傲而砥柱，必也集同志，严誓约，明气节，革弊俗，积之深，而后发之大，众志成城，而后可有为于天下。”他确信拨乱反正，雪耻振威，在此一举，所以，他大声疾呼：“其在斯乎？其在斯乎？”意识到了“时势造英雄”的历史契机，徐志摩以天下为已任，决心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的汉密尔顿，要象美国历史上那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、联邦党领袖、做过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的秘书和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那样，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一番身手。为此，他在美国立志发扬刘子舞剑、祖生击楫的爱国主义传统，取法意大利之三杰，过着一种意气风发的生活。读书，打工，了解美国社会，研究各种政治思想学派的学说，充分显示了满腔的爱国激情。

然而，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徐志摩的想法改变了。书本上的揭露，生活里的见闻，使他了解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背后的血淋淋的事实，他不再相信多开工厂、振兴实业可

以救国。他转而倾心于政治。他甚至决定研究社会主义。在纽约的那一年，徐志摩房间里的书架上有时还会有几本讲苏俄的书，有些中国留学生还曾因此而叫他布尔什维克呢！当然，徐志摩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，是马克思以前的，欧文一派的人道主义、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的社会主义，空想的社会主义。

在美国，厌恶了血腥的物质文明的徐志摩还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出发，迷上了尼采。他说：“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特登上了哲理的山峰，‘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眼下’^①。那时，他并没有完全弄懂，尼采的整体的哲学思想，却从中吸取了超人哲学里的自强不息、顽强搏斗的向上精神。

除了尼采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徐志摩最崇拜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。罗素在1920年以前的哲学著作，如《战争中的公理问题》、《社会的改造原则》、《政治理想》、《往自由之路》、《我们对外界的认识》等，他都悉心研读过，特别是罗素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确认的真理，而不向豪门权贵低头的精神，更赢得了他的尊敬。为了追随罗素，徐志摩甚至放弃了眼看可以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，从美国到了英国。

英国之行，英国剑桥的两年生活，对徐志摩的一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在美国两年，徐志摩忙的是上课，听讲，写考卷，嚼口香糖，看电影，赌咒。在英国，他也住了两年，却忙的是散步，划船，骑自行车，抽烟，闲谈，吃五点钟茶牛油考饼，看闲书。他以为，他在英国的看闲书中，与名士交谈中，得益倍蓰，真所谓有学不完的聪明。

尤其是在剑桥邪学会的活动中，徐志摩常常听到罗素激动

①徐志摩：《吊刘叔和》。

人心的演说，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，完全被罗素那倡言人道、崇尚和平的思想和尊贵创作、厌恶抑塞的意志所折服了。徐志摩观察了也研究了罗素，他写了一篇《罗素又来说话了》，认为，罗素对于人生并不失望——人类并不是根本要不得的，也并不是无可救度的；而救度的方法，决计是平和的，不是暴烈的——暴烈只能产生暴烈。在罗素看来，人生本是铄亮的镜子，现在就只被灰尘盖住了；所以我们只要说擦了灰尘，人生便可回复光明的。徐志摩以为，罗素的心目中，只要有4个基本条件存在，人生便是光明的。这4个所谓基本条件，第一是生命的乐趣——天然的幸福；第二是友谊的情感，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；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，这4个条件只要能推及平民天下就会太平，人生就有颜色。罗素之外，徐志摩交往最深的是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。他一直认为，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。狄更生主张政治社会改革，提倡古希腊式的生活。崇赞老子，敬仰歌德、雪莱等伟大的浪漫派作家，对徐志摩也有很深的影响。还有一位英国20年代颇有名气的新派画家傅来义，也是徐志摩的的终生挚友。徐志摩以为，傅来义宽厚温雅的人格，为他开了新的视野，并且鼓舞有加，使他能亲炙那些博大、美丽和高贵的思想与情感。剑桥生活时期，徐志摩还经友人介绍，结识了著名的英国作家嘉本特，女作家曼斯菲尔德。当时，年近80的嘉本特那反传统的爱人类、爱自由、眷恋大自然的本色美的思想，也浸染了徐志摩的心灵。至于曼斯菲尔德，虽然仅仅和徐志摩有过20分钟的会见，但却是“20分不死的时间”，除了受到一次美的启示，徐志摩还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启迪。曼斯菲尔德语重心长地嘱咐徐志摩“不进政治”，认为“现代政治的世界，不论哪一国，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”。徐志摩听了，觉得曼斯菲尔德的话语，竟似直达你的心灵里，抚摩你蕴而不宣的痛

苦，温和你半冷半僵的希望，洗涤你窒碍性灵的俗累，增加你精神快乐的情调，仿佛凑在你灵魂的耳畔私语你平日所冥想不到的仙界的消息。

在这些交往里，徐志摩树立起了自己的“单纯信仰”。这是剑桥文化给予他的思想洗礼。胡适后来写《追悼徐志摩》时，对此有过如下的确切的概括：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，这是他的‘单纯信仰’。他的一生的历史，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。”

基于这样的理想，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，徐志摩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热烈地信仰“一个最完善的模型，一个理想的标准，也可以说是标准的理想——实行民主的政治”，其中最崇尚的是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。

回国后的1923年、1924年，徐志摩热烈地追求着已经确立的理想。他的著名诗篇《雪花的快乐》就反复咏叹了他执著追求的快乐，还在散文《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》里向世人生动地宣传了他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。可以说，那是他回国后的一篇政治宣言。另一篇讲演辞《落叶》，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信仰。他说，从人道主义原则来观察社会，可以认为，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。感情，先天的与后天的，是一种线索，一种经纬，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。真的感情，真的人情，是难能可贵的，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。所以，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，要加密这个社会的大网，就必须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。那线如其穿连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，那时这社会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，正如天津人说的，就有根。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。

站在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，徐志摩也能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。他说：“让我们来大声的宣布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，破了的，烂了的；让我们痛快的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，道德，政治，社会，宗教，文艺，一切都是破产了的。”“我们张开眼来看时，差不多更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，那一处不是叫鲜血与眼泪冲毁了的；更没有平安的所在，因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，你还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烦闷与苦痛。”这样看，当然不错，但问题在于，当时社会如此黑暗的原因何在？徐志摩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。徐志摩说，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，或是政治的不安定，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。他把这种经济、政治和少数人即政客、军人、富翁的放肆的野心，解释贬斥为“空虚的”“自欺欺人的”、“说着容易、听着中听”的理论，“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”的理论。徐志摩要大家“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”“我们各个人的罪恶，各个人的不洁净，各个人的苟且与懦弱与卑鄙！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肮脏，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，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。”好，既然现实社会黑暗的根源不是阶级压迫，不是剥削制度，而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灵魂的肮脏与丑陋，徐志摩开出的药方当然不是革命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。他在《落叶》，还有散文诗《白旗》、《婴儿》，以及后来在暨南大学的讲演辞《秋》里，提出的救国之道，乃是回复人的天性。尽管人在回复天性的忏悔过程里有痛苦，但是，熬着、忍着、裂着、滚沸着的结果就是可以望见那象征理想境界的上帝永久的威严，宛如得到一个象征英国式资产阶级理想的民主政治的“洁白肥胖的活泼的馨香的婴儿。由俄国十月革命和日本东京大地震以后两国人民的表现。徐志摩认为，人们回复天性以后，应该具备两种最基本的品质——美好的理想，勇敢与毅力。由此看来，徐志摩所谓的

天性的回复，也就是要造成一种理想的人格。《落叶》之后，他在燕京大学的讲演词《话》里，对此所作的具体描述乃是：养成一个活泼无碍的心灵境地，利用天赋的身与心的能力，自觉的尽量发展生活的可能性，也就是，要使我们的心灵，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，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，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，使天赋的我们灵肉两部的势力，尽性的发展，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。他认为，我们人类最大的幸福与权力，就是在生活里有相当的自由活动，实现我们真纯的个性。

说到底，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与要求。

对于回到国内的徐志摩来说，人们由此看到了他的一种奇特的思想现象——象是左右开弓，他对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切都进行了批判。在1925年1月24日写的《青年运动》一文里，徐志摩就宣布：“我们不承认已成的一切；不承认一切的现实，不承认现有的社会、政治、法律、家庭、宗教、娱乐、教育；不承认一切的主权与努力。我们要一切都重新来过。”这种思想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邪学会那一班人的影响。执著地追求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的徐志摩，按着这种影响行事，回国之初，还很有那么一股子锐不可当的气势。他怀疑传统，反叛传统，对什么都攻击，都诘难。

一方面，我们看到，徐志摩在一连串的重大政治问题上，都明确地表态，站在中国人民一边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秩序。比如，1923年1月28日，他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发表《就使打破了头，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》一文，支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“罗文干案”中采取的对北洋军阀政府不合作的立场；1924年12月20日，他在《现代评论》上发表《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》，就英国处理庚子赔款的问题撕下了英国帝国主义都的虚伪面纱；1926年4月3日，他在《晨报副

刊诗镌》上编发了“3.18”惨案的专号，还发表了《梅雪争春——纪念三一八》一诗，悼念遇难者洒下了一腔热血；1928年5月3日山东济南发生惨案，他在日记里又记下了自己义愤填膺的情感和意愿；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时，聘请他当司长，他也坚辞不就。可是，另一方面，我们却又看到，徐志摩又害怕工农革命，敌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。1925年3月，他经西伯利亚、莫斯科，去德、法、意、英游历，在《欧游漫录》里留下了这种敌视。他以为，那时的莫斯科，是在文明的骸骨间，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。由此，他还有了一种免死狐悲的感伤，想到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，他就感到恐惧。出于本能，他反对莫斯科的规矩了。于是，他对那些有血性的中国青年们说，不要跟着莫斯科走！这一年10月，当他在《晨报副刊》上主持讨论“苏俄仇友问题”时，他就宣布“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事实”了，那时的中国，他承认，“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”，真可以说是“血液里有毒，细胞里有菌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，皮肤上有麻疯”；然而，他不要“流血的革命”，只要所谓“个性解放”的革命。那时，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反对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徐志摩在左右开弓，对一切都加以非议的时候，他时而精神抖擞，时而情绪灰暗，时而坚定不移，时而犹豫不决，即使在慷慨激昂地宣传他的信仰时，也不免流露了自己的怀疑。这又充分表明，他赖以支持的信念是多么苍白无力，他自己又是多么的软弱。讲演辞《落叶》说明了这一点。正是有了这软弱的一面，随着国内新军阀统治的更加黑暗，随着国内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和步步深入，徐志摩“单纯信仰”就流入了“怀疑”了。他那首题为《消息》的短诗，还有题为《自剖》、《再剖》、《求医》的散文，都记载了他希望毁了，理想的